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权绘锦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关键词]周作人;人生观;文学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4-0115-05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说:“言语行为的发生,和行为发生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实际事项的过程,都决定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全部生活史。”^{①(P25)}如果将作家的写作活动看作“言语行为”,那么,作为他“全部生活史”决定性因素的人生观,即他对人生目的、价值、理想和个人同社会关系的看法,也将从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他的写作动机与价值取向。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从1904年开始发表文章到1940年代淡出文坛,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

“五四”之前的周作人是一个“民族革命的信徒”。^{②(P179)}救亡图存时代大潮的推动,进化论与西方近现代科学理性思想的滋养,章太炎等民族革命家的感染,以及青年人特有的政治热情,使周作人形成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进取的奋斗的人生哲学,积极参与排满革命实践的行动欲望,以及舍生取义、慷慨豪迈而又通达明澈的生死观念。这种人

生观首先参透了“死生之理”,理解了个人生命必将是“向死而在”,贪恋世俗生活或祈求长生不老纯属徒劳无益。虽然“人生百年,莫不有死”,但却有“泰山鸿毛,毫厘千里”之别。于是,周作人认为,有意义的人生就应该在“人种竞争,日趋剧烈”的当今世界,为危难中的民族的自由独立和富强振兴而奋斗乃至献身。只有这样,才会“吾身虽死,自由不死。吾身虽灭,原质不灭。”^{③(P3)}才会死得其所,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不朽的人生。反观国人,周作人悲哀地发现,他们或者“死生之见存于胸,得失之念萦其虑”,^{④(P1)}或者因“谬种流传,利害倒置”而成为“兽性之爱国者”,^{⑤(P4)}或者因长久处于权势和异族奴役下而成为“槁木其形,死灰其心,侮焉而不敢知辱,捋焉而不敢知痛”的“末人”,^{⑥(P24)}或者“悲啼于苛政之下”,却能众口铍金,积毁销骨,致使“秀杰之民”“萌茁斯难”。^{⑦(P10)}这一对国民精神现实的发现使周作人深切领悟到了将希望寄托在政治革命上的虚妄,也使他开始了对国民性以及养成这种国民性的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在《望越篇》中,周作人指出:“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駘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而“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

* [收稿日期]2007-03-25

[作者简介]权绘锦(1970—),男,汉族,甘肃张掖人,河西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张其虐。两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子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⑧(P38)}

正是立足于“与中国传统的奴隶哲学截然相反的全新的人生哲学”,^{⑨(P87)}周作人发现了令他近乎绝望的国民精神现实,也发现了造成“顽迷之民,不知自觉”^{⑩(P39)}的根源在于历时久远的“种业”、礼教和专制文化。于是,他认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振兴富强的途径在于造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立国之精神”。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因为“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冀也。”^{⑪(P30)}这样,从留学日本开始,周作人便积极投身于以启蒙救亡和改造国民性为鹄的现代文学大潮,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价值观。

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长篇论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首先,周作人否定了文学的实利价值。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弊病在于“趋时崇实”而使“思想枯亡”,“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唯实利之是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这不仅导致了文学者的人格不能独立,也使得文学成为专制统治的“牢笼之具”,“良较帝力为宏厉而尤可怖也!”^{⑫(P7)}其次,周作人也不认为文学的价值仅仅在于愉悦读者或表现自我。因为前者会使文学成为游戏消遣之玩物,后者将文学视为表现个人情性之工具,“与仅为声名利禄计者”并无分别,“皆不过托文章之能事,以为一己役者耳。”^{⑬(P16)}因此,周作人既反对文学服务于政治教化或成为获取声名利禄的器具,也反对将文学视为个人消遣娱乐的玩物,从而与传统的“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的价值观划清了界限。

然而,周作人认为文学仍然是有用的。他将文学的价值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曰在裁铸高义宏思,汇合阐发之也;二曰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三曰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四曰在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进于高尚也。”^{⑭(P16)}也就是说,文学的价值在于阐发作者独到的思想发现,展示国民精神实际和道德状况,描绘社会现实生活和抒写理想,从而在国运兴盛时激励民众昂扬向上,在国运式微时暴露黑暗针砭时弊,使民众清醒认识到时代潮流趋向和生命意义所在,确立健全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和高尚美好的精神境界。周作人的这一文学价值观与鲁

迅“涵养吾人之神思”的“不用之用”^{⑮(P71)}的观念是一致的,但却更加全面和系统化。

由此可见,周作人正是在自己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生价值观的反照中发现了国民性改造实乃挽救危亡、振兴民族的当务之急,也从独立自由的现代人格之建立和有益于社会时代的双重层面上发现了传统文学价值体系的弊病,从而在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价值观念,这也是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的先声。

二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是时代的弄潮儿。《人的文学》曾被胡适誉为“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⑯(P136)}周作人所倡扬的“人的文学”是以他独特的“人学”观念为基础的。这一观念实际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以灵肉一元观为核心的自然人性论;二是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

自然人性论是周作人全部“人学”观念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首先必须承认人是动物性的存在,以动物的生活为存在基础,从而承认人的自然本能、自然欲求的合理性,肯定人的求生意志,并将“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看作“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其次,又特别强调“人”这种动物是“进化的”,有着其他动物所缺乏的“内面生活”,即精神性的、形而上的“灵”的追求与改造生活的自觉与力量。

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周作人试图建立一种能够调节人类关系以实现“高尚和平的境地”的“人的生活”的社会——道德理想,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它以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为底蕴,因而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从个人层面来说,“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先知自爱”;从个人与人类的关系上说,则强调人要有“爱人类”的自觉意识并付诸实际行动。因为“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而人类值得和必须去爱,是因为人类的进步发达是个人自由幸福生活的前提和保证。周作人举例说:“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⑰(P32)}周作人提出这套相对完备的“人学”理论旨在为现代中国人重建伦理道德体系和人生价值观念,同时为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和价值系统提供人本主义理论基石。在周作人看来,既然个人具有人类普遍共有的感觉性情,既然爱己为了爱人、“利他即是利己”,^{⑱(P34)}那么,表达个人欲求与表达人类意志就是统一的,个人的自我表现同时也就是人类

普遍的思想感情与共同理想的表达。于是,所谓“人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力于人间幸福生活的文学。”^{⑩(P49)}同时,周作人认为,文学有其不同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独特本质,即“具神思(Ideal)、能感兴(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文学必须以“意象、感情、风味三事合为一质”^{⑪(P12)}作为中介,才能够发挥感染他人的作用。所以,理想的文学应该“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⑫(P63)}这就是说,在周作人看来,文学表现的只能是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欲望,作家应该尊重自己的艺术个性,应该尊重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不应该用外在的目的限制作家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应该用指定的任务和范围限定文学应该包罗万象的表现内容。同时,由于个体与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在感觉性情上的相通性,表现作家个体思想感情的文学自然会引起他人的感兴与共鸣,自然会达到对他人的影响与感染,最终为实现人类生活的幸福、精神的丰富、道德的高尚与心灵的高贵而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周作人的这一无目的的合目的的文学价值观既闪现着张扬人性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反封建色彩,也包含着追求文学的自觉独立地位的现代性意义,不仅不同于梁启超以来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也有别于“五四”时代占据主流位置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而是立足于“人学”观念基础上的更加符合文学本身的存在与发展规律的“人生的文学”观。

从以上对“人学”观念和“人的文学”理论的分梳中可以看出,周作人服膺并试图为国人建设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道德伦理体系和人生价值观念,是他这一时期文学价值观的基础和主导性思想。尽管作为其立足点的自然人性论带有明显的抽象色彩,尽管其社会——道德理想和人生价值观念带有虚幻性和浪漫色彩,但由此生发出的文学价值观却成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风向标,也足以作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借鉴。

三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周作人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五四”时期,他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作为自己的信仰虔诚信奉,也将其作为造成“人”的理想生活的有效途径向国人宣传。但从1921年开始,周作人的

思想却发生了明显变化:由积极、明朗、乐观和有所信仰走向混乱无序、无所归依和无所信仰。在《山中杂信》中,他极为苦恼沮丧地说:“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杂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⑬(P5)}

信仰危机促使周作人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首先,周作人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中深切感受到生命的短暂、人生的孤寂与人世的无常。1921年,重病中的周作人写了《过去的生命》一诗,着重表现个人着面对死亡威胁时的无能为力,面对生命流逝的痛惜与惶恐,以及人生挣扎的无聊与无用。死亡意识的突袭促使他更加珍视生命的可贵。他批评中国人缺乏自觉的生命意识:“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取生命而无所爱惜。”^{⑭(P70)}于是,他希望人们能够重视生命、珍惜生命,能够具有古希腊人那样强烈的求生欲望,不只是苟延残喘地活着,而应该追求健全充实的生活。其次,周作人在污浊的现实中深切体味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他不再乐观天真地相信人与人之间因有着相同的感性性情,就能够相互沟通、理解、同情和爱,而是痛感人间的悲哀与惊恐,以及个人的渺小微弱和前途的渺茫。他在《昼梦》中写道:“我曾试我的力量,却还不能把院子里的草麻连根拔起。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另外,周作人在现实与历史的比照中产生了历史循环论的悲观思想,觉得祖先的坏思想行为在子孙身上会再现出来,就像僵尸重现,故鬼重来。祖先所种之“业”埋藏在我们心灵深处,溶化在我们血液之中,不仅无法根除,还会顽固地遗传给子孙后代,这是现代中国人无可逃脱的宿命。既然深感人生短暂而生命可贵,既然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互相隔膜无法沟通,既然发现“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⑮(P691)}因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只能是一场“蔷薇色的梦”,那么,周作人认为自己曾经深信不疑并竭力宣扬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和人生价值观念就必须修正。

写于1921年的《胜业》表明周作人的人生观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从《菩萨戒本经》中得到启发,认为“如见众生所作,不与同事,或不瞻视病人,或不慰忧恼”是真正的佛教徒不应有的人生态度,然而,

“自修胜业”却“不欲暂废”。这就是说,若不能普度众生,仅只自我拯救也可以是一个信徒的功德。基于这一认识,周作人认为,既然高谈阔论的宣传和社会改造活动只是“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那么,“自修胜业”就是乱世文人唯一的选择和出路。^{①(P17)}这样,周作人就将自己先前所信仰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生观中个人必须向人类和社会有所担当的承诺完全取消,个体生命价值超过了社会群体利益,现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仅在于“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许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的幸福。”^{②(P36)}

“自修胜业”表明周作人将“‘五四’时期已经提出的‘救出你自己’的个人本位主义原则发展到极端。”^{③(P294)}他已经极为无奈地向自己早年不无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作了彻底诀别。这一诀别既是周作人终生视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追求个体独立自由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权压制和“沉默的国民”所造成的坚壁面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当周作人以明达而又苦涩的语调陈述人生就是“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时,当他表明自己今后的生活只不过是“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情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④(P44)}当他将葛理斯的“生活之艺术”当作自己最喜欢的“一种很好的人生观”^{⑤(P149)}他的内心既充满着智慧的欢愉,又夹杂着面对现实倍感无奈的苦涩,既因摆脱了信仰危机而自得,又蕴蓄着不为世人理解的委屈,他既对“救出自己”充满期待和自信,又将自己“生活之艺术”的理想称为“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⑥(P267)}

随着人生观的变化,周作人对自己的文学价值观也做出了重大调整。首先,周作人卸去了文学原本承担着的思想革命与国民性改造任务,看作只是表现个人性情而达致“生活之艺术”的“情绪的操练”。^{⑦(P86)}这就使文学由渡己又渡人转变为只能度己的“自修胜业”,由“人的文学”转变为“个人的文学”,文学只能“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⑧(P334)}其次,周作人毕竟不能完全忘情于现世,即便要造“象牙之塔”,他也只想建在“十字街头”,即便因为寂寞而“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也希望“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因而在“文学上寻求慰安”。^{⑨(P330)}于是,他提出了“结缘豆”的文学价值观:“写文章本来是自己,但同时要一个看的对手,这就不能完全

与人无关系,盖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个人读”,“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⑩(P239)}

至此,周作人的人生观完成了第二次重大改变,即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转变为以个体人格完善为唯一旨归的“自修胜业”。相应的,他的文学价值观也由以国民性改造为中心的“人的文学”,转变为“自己的园地”,即以个人趣味和自我表现为中心的个性主义文学观。但无论是周作人对自己人生观蜕变的表述,还是对文学价值观的修正,其中都隐现着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在艰难时世中如此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夹杂着做出这一选择所要经历的迷惘、感伤、愤激和痛苦。

四

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从自身经历与生活感受出发,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国民精神实际完全绝望,也对信奉阶级斗争学说、推崇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的“左翼”进步倾向充满疑惧,他深信这种革命运动必将扼杀他视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个人思想精神的自由独立。于是,“自修胜业”的在家和尚既不再耕种“自己的园地”,也不再在“十字街头的塔”里向外窥视,而是转变为一个以“伟大的捕风”^{⑪(P690)}为职业的“爱智者”。^{⑫(P548)}

在写于1930年的《中年》一文中,周作人为自己的后半生勾勒了一个轮廓。他说:“本来人生是一贯的,其中却分几个段落,如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都不容空过。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于是,人到中年的周作人宣布自己要顺其自然,从青年的浪漫时代转向中年的理智时代,从此脱离“市街战斗或示威运动的队伍”,以“得体地活着”为人生目标与归宿,“用经验和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⑬(P63)}这一人生观的自觉转变既立足于周作人极为熟稔的生物学与人类文化学知识,也来自于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酷环境中对自身乃至知识分子身份、使命、责任和本性的深刻思考与独到认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尽管“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但知识分子的本性与使命就在于“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之老死病苦”,这不仅是对付“虚空的唯一的办法”,即“虚空之追迹”,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伟大的捕风。”^{⑭(P692)}周作人所确立的以“人情物理”为核心、以“伟大的捕风”为

使命的人生观和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认证,既不同于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也与“五四”以来以启蒙救亡为己任的时代潮流殊异,而与古希腊“爱智者”传统接续。知识分子的本性就在于热爱真理、探求真理,并在读书、思考与写作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同时以此排遣寂寞、聊以自慰,为枯燥粗粝的现实人生增添一份难得而又苦涩的乐趣。

随着周作人“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和成功的一种人生观”^{⑨(P641)}的确立,他的文学价值观再次得到重大修正。不过,这一时期周作人对文学价值观的论说大多并非理论“空谈”,而是结合自身的创作体会,更多地阐明和解说自己“抄书体”文章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在周作人看来,此类文章的价值首先在于作者以明净的观照态度,“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披沙拣金”,^{⑩(P143)}与故人晤对,不断充实、丰富、扩大自己,建立起支撑自我的精神支柱,进而写下自己的思想发现,使自己寂寞的内心得到慰藉,精神得到升华。其次,周作人认为文学也并不仅仅在于闲适消遣,还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因而,在“抄书体”文章中,他更多地将自己思考与探索的触角伸向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内部,对传统文化做出整体性反思,并融合古希腊、日本以及西方近现代文化中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接棒的部分,建立一种古老而又全新的“儒家人文主义”文化统系,实现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更生再造。

总之,自从事文学活动开始,到 1940 年代为止,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从鼓吹民族革命的器具变为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人的文学”,再变为“生活之艺术”的个性主义文

学,最后变为改造中国文化传统的“伟大的捕风”。这一演变过程既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关头或顺应,或背逆,或积极响应,或消极抵抗的文化选择有关,也是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转变(从“民族革命的信徒”变为启蒙主义者,再变为个人主义自由知识分子,最终成为一个以“人情物理”为标准衡量和评判社会历史、现实生活、思想谱系和文化传统的“爱智者”)过程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更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在艰难时世中精神蜕变与自塑过程的表现。

[注 释]

- ①(美)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②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M]. 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③④⑤⑥⑦⑧⑩⑭⑮⑯周作人. 周作人文类编(1)[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⑨⑰钱理群. 周作人传[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⑪⑫⑬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周作人. 周作人文类编(3)[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⑮鲁迅. 鲁迅全集(1)[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⑰胡适. 胡适文集(1)[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㉔㉕㉖㉗㉘㉙㉚周作人. 周作人文类编(9)[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㉓㉔周作人. 周作人文类编(5)[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㉕周作人. 过去的生命[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㉖周作人. 周作人文类编(6)[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朱德东)

On life outlook and value outlook of Zhou Zuoren

QUAN Hui-jin

(Chinese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s an author who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new literature history, Zhou Zuoren experienced many changes in literature value outlook, which not only depended on the change of China modern history development but also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change of his life outlook at different historic periods and life periods. Thus, an effective angle to clearly describe Zhou Zuoren's literature thought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is to study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his life outlook and his value outlook.

Keywords: Zhou Zuoren; life outlook; literature value outlook